

国外食物革命

≡ 与畜牧业发展

FOREIGN FOOD REVOLU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林祥金 刘 政 刘玉满编译

林祥金译校

7.33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京新登字)061号

国外食物革命与畜牧业发展

林样金 刘 政 刘玉满 编译

林样金译校

责任编辑 赵学贤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建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印张: 10.625 字数: 272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册 定价: 8.00元

ISBN 7-80026-282-0/S·219

编 译 序

几年来，我们一直想编译一本关于国外食物革命和畜牧业发展的书。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食物革命虽然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但是，它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外在食物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收入水平与动物蛋白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计划我国的食物结构调整时，国际比较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几乎时时要问：中国目前的食物结构调整已经到了哪一阶段？同国际比较起来，其步伐是快了还是慢了？支配食物结构调整速度差异因素是什么？如何估计中国食物结构调整的未来目标？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指导今后食物生产和消费以及价格改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更多地了解并介绍国外这方面的情况和经验，以便引起国内学者、实际工作者和政策制定机关的重视，应是我们从事畜牧业经济研究工作的人的重要职责之一。第二，正如食物结构调整在中国是近10年来才出现的新事物一样，畜牧业作为一个产业的经济研究，包括养猪业，奶牛业，肉牛业等，在中国也是新事，相对说来，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中，以及其他文献中，有关农业经济问题，更多地是侧重于“作物经济”，而有关畜牧业经济的研究，则是比较薄弱的。这自然包括了国情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则必须加强畜牧业经济研究，否则我们很难满足现实生活对农业经济学的要求，而为了这一切，除了自己摸索外，更多地了解国外是怎样研究畜牧业经济的，则是完全必要的。第三，198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下达了我们一项研究我国奶业发展战略的科研项目，为了完成国家科研项目，需要广泛搜集资料，包括借鉴外国经验的资料。在目标确定以后，外文资料的来源就是重要问题。几年来我们注意从以下几方面搜集材料：一、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学术资料室；二、外国朋友赠送资料三、出国考查、访问带回的资料。经过较长时间的搜集、积累，形成该书。

本书共收集了以下11篇文章：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食物革命”（由美国学者罗伯特·狄斯其著），论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收入增长以及物价的长期固定在较低的水平上，带来了对动物蛋白食物需求的增长，从而导致了食物革命，文章讨论了食物的低价政策和主要依靠生产补贴发展畜牧业的弊端，认为前者可能导致需求超前以及食物短缺，后者使生产单位缺少发展生产的内在经济动力，从而难于满足消费者对肉、蛋、奶等食物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特别是质量上的需求。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在价格和发展畜牧业政策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苏联的畜牧业经济问题”（由旅英苏联学者佐勒斯 A 米德维得夫著），讨论了发展畜牧业经济特别是增加动物蛋白生产的意义，回顾了苏联在发展畜牧业经济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价格政策、乳品加工布局、饲料供应等问题。这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畜牧业经济面临的问题，这同我们改革前以及目前改革中的某些情况有共同之处。显然，认真研究这些情况对我们是有益的。

“日本的饮食革命和肉牛业”（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现任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主席约翰 W. 朗沃斯著），通过对日本国民饮食习惯的改变的考察，分析了食物革命的原因：收入翻番和伴随生活标准提高的饮食习惯的变化。特别有趣的是，作者指出：“在核心家庭（即子女结婚后单过——译者注）和独身户中，人们花在购买食物和烹调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高于复合的或扩大的家庭，因而，简单方便的原则已经成为这些家庭确定他们饮食的关键因素”。因此，营养、方便、效率

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都对畜牧业的发展带来直接影响。

“日本的肉牛和乳牛业”（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局著），分析了日本在食物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两个重要的畜牧业产业——肉牛业和奶牛业的政策问题。一方面，由于农业机械化和兼业农户的发展，小规模养牛的数量日趋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特别是质量较高的牛肉的需求越来越增加。在牛奶特别是鲜奶供应方面，存在着大米生产过剩和大城市郊区奶牛主要依靠进口谷物和浓缩饲料的矛盾。日本政府采取了支持建立较大型的肉牛育肥场和将东京郊区奶牛转移到北海道等边远地区饲养的政策。

“今日的日本农业和畜牧业”（日本学者杨希朱和库洛得著），根据恩格尔定律全面分析了日本在70年代前后食物消费支出占整个生活费用支出的比重的变化情况，概述了日本食物革命的过程，以及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食物的需求，日本所采取的政策，包括进口饲料的政策。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其食物革命前，肉、奶、蛋消费水平低、居民的食物习惯重主粮等，与我国相似，认真研究日本食物的经验对我们是有用的。

“美国的养猪产业”（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美国农业部经济服务局专家罗伊·范·阿斯多尔等著），根据美国农业部1981年组织的对1,264个猪场的抽样调查，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养猪业的发展历史、所有制形式、土地利用、规模经济、经济管理、销售渠道等，对于我国养猪业如何由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过渡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研究畜牧业的部门经济的可供借鉴的方法。

“美国的畜产品运销”（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杰弗里S·谢泼德等著），分别论述了肉牛，猪，牛奶和禽蛋的运销的发展历史，以及流通渠道、价格政策、供求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我国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有一定现实意义。

“泰国肉鸡业的合同制生产”（泰国学者尼普·波安普沙科

著），讨论了以公司为龙头，产供销相结合的一体化合同制生产。泰国通过合同制生产，在千家万户基础上实现了肉鸡生产现代化，使肉鸡出口猛增。

“英国的食物消费与需求”（英国农业经济学家贝克莱·希尔等著），论述了作为早已实现食物革命，即肉蛋奶消费量已达到饱和的西欧国家之一的英国的目前食物消费量、食物消费模式、对食物的需求及需求价格弹性等。

“印度的佛罗德计划与国际乳品援助”（荷兰经济学家马丁·道伯斯等著），全面分析了在世界各地（包括我国在内）有广泛影响的印度佛罗德计划的效果，佛罗德计划的直接好处是提高了印度乳品的有效供应，减轻了西欧国家乳品的生产过剩的压力，但也带来了对西欧乳制品供应的依赖性。

“澳大利亚的奶业政策”（澳大利亚经济学家R·K·赫福德著），论述了澳大利亚奶业价格政策制定的历史发展过程。阐述了由主要依靠财政补贴牛奶价格到主要依靠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的价格政策转变及其效果。文章还深入讨论了政府在调整奶业政策中的作用和目标。对于我国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本书的出版得到陈道教授和张乐昌同志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谨此致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林祥金

1991年5月

目 录

编译序·····	林祥金 (1)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食物革命·····	(美) 罗伯特·狄斯其 (1)
苏联的畜牧业经济问题·····	(苏) 佐勒斯A·米德维得夫 (26)
日本的饮食革命和肉牛业·····	(澳) 约翰W·朗沃斯 (49)
日本的肉牛和乳牛业·····	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局 (68)
今日的日本农业和畜牧业·····	(日) 杨希朱、库洛得 (108)
美国的养猪产业·····	(美) 罗伊·范·阿斯多尔等 (132)
美国的畜产品运销·····	(美) 杰弗里S·谢泼德等 (189)
泰国肉鸡业的合同制生产·····	(泰) 尼普·波安普沙科 (245)
英国的食物消费与需求·····	(英) 贝克莱·希尔等 (263)
印度的佛罗德计划与国际乳品援助·····	(荷) 马丁·道伯斯等 (288)
澳大利亚的奶业政策·····	(澳) R.K.赫福德 (310)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食物革命

(美) 罗伯特·狄斯其

一、苏、东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进退两难

苏、东国家领导者关于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来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以便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然而，他们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动力主要依靠思想工作，而不是经济规律，使苏、东国家从落后的国家转变成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想法面临着困境。他们采用的是高度指令型的计划经济。

高度指令型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吸收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方法方面是很不灵活的。随着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在消费品需求方面（特别是对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提出了新的需求。而这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管理方法来说是无法满足的，苏联和东欧的过时的经济决策模式对于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

苏联和东欧国家模式的特征：高度集中和指令性

高度集中化是苏联和东欧经济体系的基本问题，并且可以用来作为理解为什么苏、东国家消费品需求一贯短缺的主要背景。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即使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但是在计划与管理的方法上都依然保持不变。显然，这种以各个州的经济高度控制在中央集权手中为特征的模式，要管理好现代的苏联经济，其困难是巨大的。虽然，这种经济结构影响到社会经济各方面，但在这里仅分析这种方法对农业的影响，以便说明其进退两难。

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在农业和工业结合上，中央计划体制鼓励农业发展的問題。现有的产前工业（即农业投入如肥料等）和产后工业（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产品流通和服务的调节机制，由于缺乏集体农庄管理者的直接参与和合作，已被证明是难于胜任其任务的。同时，由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华沙和布拉格的中央计划部门来计划农产品产量，难于估计各地的气候条件和各种符合当地情况的种植方式和收获安排。目前的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由于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距离远等原因，不能保证及时和有效地供应市场需要。难于克服因全天候通车马路的缺乏，造成的交通运输的瓶颈。所有这些高度集中化计划管理体制，由于浪费和效率低，给农业总产值造成了重要的损失。1980年，列安尼德·布勒兹尼夫估计，这种损失在粮食方面高达20—30%。据西奥斯库估计，在罗马尼亚，粮食运销的损失的数字也是类似的。

工业化和结构改变

对比经互会各国，苏联的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居中等水平，而这可以用于大致表示工业化的水平。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27%、31%和37%，可以划分为农业—工业国。东德（10%）和捷克斯洛伐克（11%）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匈牙利（21%）在某些方面为中等水平。在过去的20年中，苏联在产业结构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在1960年，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2%，而在今天仅占14%。当然，这个数字比起西方国家来仍是高的。在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3%。在西欧为5—6%。

上述结构上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带来非常好的结果。首先，工业化的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这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等面临食物短缺的经互会国家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又依次决定着人均收入的高低，是过剩还是亏空。虽然收入增加的程度在各年间不

同。但是，在过去的10年间，苏联消费者的购买力有了稳定的增长。然而，这对于一个国家由于工业的发展带来对食物特别是对高蛋白食物的增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最后，工业化的发展还影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购买力的分配。即使对于想要保持工业和农业之间工资水平或多或少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的工资或薪金也仍然比农业劳力高（见表1, 2, 3）。这种不同的工资水平发展趋势，往往在工资较高的地方集中了较高的消费需求，例如在城市的食物供应越来越向“奢侈”的方向即肉类发展。

城市化

苏联农业的结构伴随城市化的发展有了相应的改变，在1960年，苏联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为25个，到目前为止已翻了一番。同样的，自1945年以来东欧国家的城市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在东德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2个，2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至少5个。在1945年，保加利亚超过10万人的城市仅2个，目前达到7个。在罗马尼亚，目前超过22万人口的城市有8个，而在20年前仅5个。与此相适应，城市人口的比例也有增加。1959年，苏联城市人口为47.9%，到1970年提高到56.3%。目前已达63%。这种转移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例的降低。然而，由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逐渐降低。在1960—1970年平均每年转移率为2.7%，而在1970—1980年降低到1.8%。但是，这种劳力转移对于农村劳力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当考虑到已经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龄大约25岁，而留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数是老人时，这种情况更重要。

最后，一个较高的城市化趋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较高的向往已经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的人口比例。城市的通讯网络将更加复杂和高级。在经互会国家的城市的食物结构将越来越增加对肉类、水果和蔬菜的消费。而在农村，面包、谷物、土豆的消费仍占主要地位。

在苏联，食物供需失衡可归因两方面，一是人口的绝对增加，二是人口的结构变化。然而，苏联人口的增长就其本身来说对于苏联农业问题的影响远没有达到许多其他不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程度。在1975—1980年，苏联的人口增长率大体保持在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平均每年增长0.9%），略高于西欧（平均每年增长0.4%）；同日本相等；近似于美国（平均每年增长1.0%）。而且，在1980—2000年，苏联的人口增长率预计可降低到0.8%，到2039年，苏联人口大约将达到6亿。东欧面临一个与目前相当的人口增长率，即由匈牙利的0.4%到波兰的1.02%，东德则异常，仅0.02%，增长中的人口数量和不断提高对较好食物的需求水平，将不可避免地给已经负担过重的农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表1 1970、1975、1978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月平均工资

	卢 布			%		
	1970	1975	1978	1970	1975	1978
全 苏	122	146	160	100	100	100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126	153	168	103	105	105
乌克兰共和国	115	134	146	94	92	91
白俄罗斯共和国	106	126	141	87	86	83
乌兹别克共和国	115	137	148	94	94	92
哈萨克共和国	124	148	160	101	102	100
格鲁吉亚共和国	106	118	134	87	81	84
阿塞拜疆共和国	110	125	138	90	86	86
立陶宛共和国	120	142	158	98	97	99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103	117	129	84	80	81
拉脱维亚共和国	126	146	161	103	100	101
吉尔吉斯共和国	113	134	144	92	93	90
塔吉克共和国	118	136	141	96	93	88
亚美尼亚共和国	123	139	153	100	96	96
土库曼共和国	130	158	171	170	111	107
爱沙尼亚共和国	135	160	178	111	110	111

资料来源：摘自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统计年鉴和计划执报告

自1970年以来，苏联的人口增加了大约3000万。然而在那个时期（至少到1980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增长了229万吨，也即10年中人口增长了12%。而粮食的年增长率为1.3%。当然有许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苏联会由一个纯粮食出口国变成纯粮食进口国。其中之一是，正如苏联人口统计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了。可是，这种事情在美国也同样发生过，不同的是，在美国伴随着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而在苏联，随着类似的人口转移，却带来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在一个农业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随着大量的人口由农业转移出去，没有相应地增加机械化。

地区间发展悬殊：高低不平的现代化困境

表2 1975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月平均工资

	总 计	工 业	农 业	交通运 输业	邮 电	建筑业	商业
全 苏	145.8	162.2	126.8	173.5	123.6	176.8	108.7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153.2	167.9	134.6	185.2	130.8	183.1	113.6
乌克兰共和国	133.5	133.0	115.2	147.4	111.1	155.9	99.3
白俄罗斯共和国	126.0	138.7	95.8	146.8	107.0	153.7	102.0
乌兹别克共和国	136.6	151.9	121.0	171.7	122.3	178.9	106.2
哈萨克共和国	148.5						
格鲁吉亚共和国	118.5	138.4	79.3	146.0	92.9	173.5	96.0
阿塞拜疆共和国	125.1	140.0	99.5	142.0	97.9	174.8	92.2
立陶宛共和国	142.3	155.4	116.6	165.2	107.1	179.7	108.5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117.0	129.0	99.1	141.8	103.7	139.4	98.0
拉脱维亚共和国	146.4	154.5	129.4	173.3	114.7	185.3	111.4
吉尔吉斯共和国	134.2	153.7	112.1	165.9	127.0	164.2	103.6
塔吉克共和国	136.2	147.8	110.7	169.5	119.9	172.7	109.0
亚美尼亚共和国	138.6	156.4	101.2	153.5	110.2	205.9	98.9
土库曼共和国	158.4	169.6	174.6	180.5	143.0	203.5	116.2
爱沙尼亚共和国	159.8	185.9	179.4	198.5	141.1	203.6	118.0

资料来源：各加盟共和国的统计年鉴，其中土库曼共和的资料为1974年，1975年的平均工资为161.5。

(续表2)

	卫生保健	公共经济	文 教	科 学	信贷保险	政府机关
全 苏	109.0	102.3	122.9	157.5	133.8	131.8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113.4	107.4	125.2	162.1	142.8	138.5
乌克兰共和国	101.0	91.6	117.3	142.4	121.9	116.8
白俄罗斯共和国	100.8	95.1	118.2	127.8	118.5	118.2
乌兹别克共和国	100.5	98.7	123.4	146.2	113.9	122.2
哈萨克共和国						
格鲁吉亚共和国	92.8	89.6	118.1	134.8	105.8	113.8
阿塞拜疆共和国	83.4	92.4	132.1	143.6	126.5	130.0
立陶宛共和国	112.1	108.1	129.4			132.3
摩尔多维亚共和国	96.7	94.7	114.8	126.3	127.9	119.0
拉脱维亚共和国	117.6	107.3	127.3	141.4	131.5	132.1
吉尔吉斯共和国	102.3	97.1	124.7	145.6	116.4	122.4
塔吉克共和国	98.6	106.4	123.6	148.2	118.3	122.5
亚美尼亚共和国	92.3	109.9	124.5	140.2	117.3	123.2
土库曼共和国	118.9	110.9	142.2	165.7	114.1	132.3
爱沙尼亚共和国	131.5	114.1	131.6	154.6	136.9	146.5

人口增长:

尽管在过去40年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取得平衡的发展,在东北部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的发展远落在西部地区的后面。同时,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生活水平上仍然保持比较大的差距。在许多方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象一座艺术城市,在那里的供应系统要远远好于其他地区。虽然苏联计划制定者进行过各种试验,以纠正这种不平衡。但当他们供应不同地区的基本的消费品时,没有设计出一个计划来,以便使国家的边远地区的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计划旨在使各个地区均匀的发展,以便建设成自给自足的独立自主的单位。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由西部向东部移民,以便发展远东的采矿、森林采伐、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近年来,苏联的计划者已经作出结论,

认为这种使各个地区均衡发展的原则，既不能达到也不是一个特别合乎需要的目标。一些地区的气候完全不适合于耕作。另外，有的土壤不能用于农业生产。在发挥边远地区的工业潜力中，苏联政府尚没有解决如何鼓励劳动转移到这些地区的问题，因为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发展需要进行专业化生产，以便与地区的资源优势相适应。在某些缺乏可耕地和劳动力的地区，尽管它合乎发展工业生产的目，也不宜进行粮食生产。

按照计划，要发展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到2000年需要动员7500万人转移到这里。由于不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用强制方法强迫移民的老路去，直到现在，苏联的计划者仍只局限于用最少量的必要的人力去开发这些地区。

二、苏联的畜牧业生产

在苏联，多数年份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快于农作物生产的发展。因此，饲料粮的供应没有能与需求的增长保持同步增长，同时使得从西方国家大批进口粮食变得有必要。可以预见，在未来由于对肉类的需求在不断地增加，发展畜牧业生产，将会成为苏联农业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在60年代，苏联畜牧业生产率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在70年代畜牧业产量的增长率显著地降低。虽然如此，苏联计划者仍设计到1985年，苏联的肉类产量将由1981年的1520万吨提高到1725万吨。

然而，由于在1976—1980年畜牧业生产增长的停滞，使人们得出结论，由于饲料问题的扩大，因此，所计划的目标不够现实，影响苏联畜牧业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既有畜牧业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例如饲料粮的短缺，尽管这些问题同苏联整个经济有关。对这些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包括甚至增加饲料供应也不能提高畜牧业生产率，需要苏联政府给予很大的注意才能解决。

饲料转化率。同西方比较起来，苏联畜牧业的饲料转化率相对较低。因此，在一定的畜产品产量下，苏联必须花较大数量的

饲料粮去增加畜产品重量，其中，牛的料肉比最高，鸡较低，猪居中，即使对于优良畜种，也由于饲料粮和蛋白质饲料添加剂供应不足，而抵销了质量上的差别。

私人养畜。在苏联，私人养畜的肉类产量占其总产量的30%。这与私人养畜的极小规模比较起来，很不相称。然而，如果来自集体（即社会主义经济）的饲料供应不能增加，则私人养畜要想维持这个纪录就会遇到困难。同时，如果小规模私人畜牧业的产品由国家收购，则还要分付很大的精力去解决交通问题。据说，如果大量的投资用在有利于私人养畜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将会影响集体生产的增长。另外，单一的价格体系对私人养畜生产的障碍要大于国营或集体生产。由于私人养畜不能得到与国营或集体同一水平的补贴。这些生产蛋、奶和肉的私人养畜者只好求助于黑市，在那里他们的商品可以卖得更逼真反映供求平衡的价格。

私人养畜的障碍，由于零售价格体系不反映供需关系，信贷难于获得，以及城市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私人销售渠道不被鼓励，因此，在苏联私人养畜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很少刺激。虽然，目前私人养畜的耕地只占全国的2.7%，其生产的肉类和蛋类却分别占全国产量的31%和34%。私人养畜的大部分饲料生长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或者作为农民的一种劳动报酬被支付。由国家决定的饲料价格对农民缺少刺激，而代表了目前的“半夜领料”的形式（这种形式曾在战时共产主义和合作化前期实行过），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国家如想达到肉类产量的目标，它则很难置私人养畜于不顾。增加苏联农业产量的最便宜的方法将是扩大私人生产的耕地和增加刺激，并由市场决定饲料价格。

为了提高私人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应扩大对这些单位的投资信贷。由于官方强调提高生产率的重点继续放在社会主义大规模农业方面，这种政策包含较小比例的资本投入和饲料粮供应流向私人生产者。对私人小块土地生产的劳动力短缺的重视程度也远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差。在那里正通过奖金和教育来维持农村

劳力。

价格扭曲。在苏联，许多食物，特别是肉类，其零售价格长期显著地低于生产成本。由于投入和产出价格之间的扭曲，尽管苏联政府想将价格固定在全国统一的指数上，但是由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差，以及官方不鼓励任何地区之间的私人商业，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价格不同的趋势，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没有采取刺激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措施，特别是由于不断扩大对上述两种生产类型的生产补贴，更加加剧了这种状况。

在过去的15年中，农业投入的价格提高了约70%。在1965年，每生产100卢布的农产品需要花费70卢布成本，近年来提高到107卢布。同时，对进口肥料、饲料和其他农业投入的需要，使苏联农业不能避免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另一方面，食物零售价格却没有增长这么多，在1969—1977年，虽然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承认，但据估计，平均每年只提高3.4%。当然在城市通货膨胀率略微高一点。在1981—1985年，苏联政府为了解决生产中存在的生产成本上升、收入下降的问题，采取了对农产品零售价格实行计划价格，而增加农业补贴的办法，自1983年以来，平均每年生产补贴高达160亿卢布。最近一位苏联经济学家指出，苏联扩大食物生产补贴的办法，从长远来看并没有改善市场供应。

自30年代以来，发展工业在苏联计划者的头脑中占居支配地位，很少有人敢于向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信条发出挑战。在过去的50年中，苏联农业的经济形式非常单一，仅允许三种生产系统存在：家庭辅助经济、合作社农场和国营农场。与此相同，生产的管理方法和计划机制，也同30年代一样，严格控制在中央机关手里。同时，在管理制度和生产方法上，普遍缺乏改革的状况一再得不到改变，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苏联社会广大基层。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愿望主要体现在现代苏联公民身上，他们在家庭开支上开始要求较大的自由选择机会，无处不是这种要求的变化要比实际的食物消费模式和需求的变化明显得多。工业

化使苏联人民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意识，即强迫国家在长期耽擱满足消费品需求面前，把较少的力量放在“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信条上。

三、中等收入的挑战

收入和社会阶层

在40年代和50年代，在苏联被用来加速工业发展的方法之一，是从收入中提取一个较大的部分用于使用关键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斯大林时代，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被显著地扩大了。然而，自5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又慢慢被颠倒过来。例如，在工人之间，最高的工资水平与最低的工资水平之间的比例，在钢铁行业由3.6:1下降到2.6:1；在轻工业行业，由2.6:1下降到1.8:1。在机器制造业，由2.5:1下降到2:1。平均最低月工资由1965年的40卢布增加到1975年的70卢布，增加43%。在1976年工人的平均工资151卢布，1981年提高到172卢布。

事实上目前在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种情况在东欧各国也同样存在（见表3），根据苏联官方的报告，在1980年，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85.4卢布，而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49卢

表3 1955—1980年若干经互会国家农业工资占制造业工资 %

国 家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保加利亚	84.0	87.0	85.0	91.7	92.0	93.0
捷克斯洛伐克	76.3	85.0	90.0	89.4	88.6	88.5
东 德	78.8	83.7	89.5	100.2	101.9	98.5
匈 牙 利	—	86.2	94.3	100.0	98.6	95.1
波 兰	70.2	72.5	74.6	90.6	86.8	87.0
苏 联	—	62.8	76.3	83.0	81.3	83.2

资料来源：国际劳动办公室，劳动统计年鉴（日内瓦，1960，1965，1970，1983）